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课题

董明 [著]

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
政治稳定和发展在我国的价值规范 ▲ 私营经济总体绩效与政治稳定和发展
私营经济的运作机制与政治稳定和发展 ▲ 劳资关系状态与政治稳定和发展
贫富差距与私营经济发展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心态研究 ▲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我国社会民主化 ▲ 政府功效及制度构建 ▲ 他们都是建设者

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中国经济出版社
www.economyph.com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课题

政治格局中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

董 明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 董明著.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1

ISBN 7-5017-5403-9

I. 政... II. 董... III. 私营企业-阶层-关系-政治-研究-中国 IV. D6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620 号

责任编辑: 刘一玲

封面设计: 高书精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艺辉印刷公司印刷

*

开本: A5 1/32 13.75 印张 33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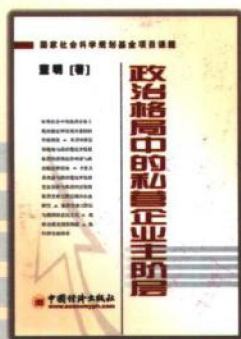
ISBN 7-5017-5403-9/F·4337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董明，女，1966年3月出生，浙江上虞人。1988年浙江大学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1年武汉大学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

自1991年从教以来，除搞好必要教学工作外，基本上笔耕不辍。迄今在国家及省级以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获省部级优秀奖励10余次。参与编撰学术专著6部。自1993年以来开始关注和跟踪私营经济及其业主的发展状况，撰写并发表了部分有关私营企业主研究的学术论文。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的最终成果。作者以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一个具体的市场经济主体——私营企业主阶层，探讨了该阶层与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的互动状况。书中不仅从经济层面通过对私营经济总体经济绩效、私营运作机制、劳资关系及其与我国贫富差距现象间的纠葛等多角度剖析了该阶层与政治稳定和发展关系，而且，进一步从政治和文化层面剖解了他们扑朔迷离的政治心态，以及他们与我国社会民主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通过多角度、多学科结合的立体式透视，最终得出结论是：该阶层与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在整体上是相通与一致的，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本书在内容上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在实践上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书籍。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	(7)
一、产生及其社会来源分析	(8)
二、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定性考量	(21)
三、私营经济及其业主在我国的发展时空探微	(34)
第二章 政治稳定和发展在我国的价值规范	(41)
一、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内涵、关系及其评价	(42)
二、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的模式取向	(46)
第三章 私营经济总体绩效与政治稳定和发展	(54)
一、私营经济复兴的客观逻辑	(54)
二、私营经济的实际绩效考评	(70)
三、私营经济的发展路径前瞻	(89)
第四章 私营企业的运作机制与政治稳定和发展	(95)
一、私营经济市场经营行为基本特征及其总体走势	(96)
二、私营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优劣分析	(112)
第五章 劳资关系状态与政治稳定和发展	(134)
一、雇佣劳动关系再生的客观必然性	(134)

二、现阶段劳资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原因剖析	(143)
三、对劳资关系的动态广角考察	(165)
第六章 贫富差距与私营经济发展	(192)
一、贫富差距与经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一般理论	(192)
二、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总体状况及其基本特点与 焦点	(204)
三、贫富差距与私营经济发展	(222)
第七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心态研究	(272)
一、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规范分析	(272)
二、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心态现状的实证分析	(282)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心态发展趋势探析 及其评价	(308)
第八章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我国社会民主化	(323)
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关系的一般理论	(323)
二、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我国社会民主化内在逻辑 透视	(341)
第九章 政府功效及制度构建	(380)
一、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效用及政府职能定位	(381)
二、构建适应我国私营经济健康发展需要的 制度环境	(393)
结束语 他们都是建设者	(427)
主要参考文献	(431)

导 论

伫立于 21 世纪之初，回望 20 世纪的中国，它所展示的无疑是一幅纵横捭阖、激荡整个社会的全息图景。透过其纷繁复杂的表象，蕴含其中的则是一个主题：中国人民矢志不渝地寻求国家富强稳定、民众幸福祥和的最佳路径。经过血与火的多次洗礼、正确与谬误的反复较量后，直至上个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这艘历经沧桑的古老航船才终于驶入正确航道，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而这一生机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来自于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和对现实理路的勇于创新。20 年来中国这段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集中表现在由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换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全面转型这一亘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局之中。经济体制转换和社会转型，直接导致了社会利益群体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在此期间，始终成为思想和行动冲突焦点的，则正是如何科学对待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的私营经济及其企业主。

因此，本课题所指称的私营经济，特指改革开放后在大陆范围内中国公民投资的私营企业。换言之，（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均不包括其中，尽管他们在大陆投资建厂，也是私营；（2）尽管港、澳、台人士都是中国人，从广义上讲，也可以称其为中国私营企业，但此二类企业均不属于我们在此所要讨论的私营企业，而将它们包容于“非公有制企业”范畴更恰当。作为本课题研究指向的私营经济，从其诞生之初起，即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因历史惯性等多种因素，其发展路途远

非平坦，但不管怎样的遭际，它仍是顽强的经济，具有顽强生命力，它在国有经济不能占领、不便占领或不必要占领的空隙处生长、发育，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有人说，只要放开私营企业想象的空间，财富便会产生。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这样描述中国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他说，中国如果没有了湖南人，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的经济，如果没有个体私营经济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

对于这样一种独具特质和活力的经济形式，应当说它从一开始便引起了众多关注现实的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并为此积极建言献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私营经济的一路前行。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关注的目光基本来自经济学的视野以及少量社会学的视角，却鲜有政治学层面的关注。由于现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纯经济的，因此，尽管经济因素确实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但仅考虑经济变量而不涉及其他变量的纯经济理论往往把握不住经济发展的变化。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等煌煌经济学巨著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这些经典作家在研究解决经济问题时对政治的深切关怀。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经济与政治的纠葛则更深一层。在中国，若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像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就私营经济而言，从其萌芽之初至今的 20 多年历程中，更是与我国的政治气候处于一种息息相关的境地。但恰恰在此问题上，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却显得异常苍白，甚至还有点讳莫如深。正因此，尽管今天的私营经济在经济上已不再可能被忽视，但严格说来，它还不够健全，因为在长时期中，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或名份未予清晰厘定，而这显然不利于其持

续良性的发展。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早已定下,WTO业已加入,从而使私营经济在我国快速发展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此时,仅从确保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稳固的角度考虑,我们已不能不高度重视从政治学的视角维度来关注私营经济及其企业主的现况及发展趋向。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课题选取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私营经济及其业主。由于私营企业主乃私营经济的人格化身,是私营经济真正活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我们考察问题的本原所在,而对业主的关注也恰是学界的一个薄弱环节,故而本课题最终将研究的落脚点定在了私营企业主身上。他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向何方?他们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局处于一种互相支援的情状还是此消彼长的态势?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算不得是什么太超前的话题,其实现实中已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面临了有关这方面的难题,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在这里却付之阙如,这不能不令学者难免有些许尴尬。

诚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之中,在这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谁,想要发明一种万能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包容无遗的阐释模式或灵丹妙药,显然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奢望。故而,选取一个有限的视角,进行一种尝试性的观照,可能更为明智和理性。在本课题中,我们就试图截取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

本课题共分9章予以展开。第一章和第二章首先对研究的主体对象,即私营企业主的实然状况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分别进行界定和规范,以期为以下各章的研析提供基本的理论和观点铺垫。由于在理论界,迄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仍有不少歧

见，如若在这一点上不首先给出我们的观点，那么以下章节的讨论将很难继续。因为没有有一个预设的、统一的衡量和评判标准，从而也就不可能使问题的探讨取得某一方面的深入成果。

如前述，以私营经济为惟一物质依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私营经济的人格化身，他们对政治稳定和发展关系因而首先最主要、最直接地正是通过这一客观物质载体得到体现。所以，从第三章到第五章，通过分析私营经济总体绩效、私营企业的具体运作机制、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状态这三大方面对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关系开展研究。

世界处于一种普遍联系的状态，存在于其中的任何人或组织，亦莫不如是。研究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治的关系，当然更离不了将其置于社会大格局中来探析。第六章到第八章就是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的。第六章从私营经济与社会贫富差距的关联角度进行分析，试图客观地评述它在目前已经成为国人关注焦点之一的贫富差距问题上的功过是非。这是相对较近期的话题。而从较长远角度看，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力量处于上升期的阶层，它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将会不断加大，那么它与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定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我国，其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是正向的抑或逆向的，即是促进的还是促退的，这是不能不予以认真探讨的课题，也是第八章的基本内容。当然，私营企业主不仅仅是物化的人，更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以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断语来分析，他们主观上对政治的感应状况当是更为直接更为科学的反映体，而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确也是颇值反复玩味的研究域。这就是本课题第七章的研究内容。

本课题第九章即最后一章的探讨内容是关于政府功效及制度构建。由于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联动的特性，而我国的私营经济

更与政治呈一种客观上的胶着状态，因此，我们分析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不能仅局限于私营经济自主发展的一面，同时还必须分析作为政治具体载体的政府及其制度对它的作用与反作用。实质上，我们的政府在私营经济的发展上影响极大，乃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直接掌控着其生杀予夺的大权。因之，在我们研析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是绝不能“忽略”政府的作用的。诚如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的悖论：成也国家，败也国家。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题。这不仅在于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尚属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拓荒性工作，而且还由于对该问题若要给出比较认真的回答，无疑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划分日趋细化的今天，对于一个从政党和政治门户出身的人而言，显然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所幸的是，由于身处浙江这个私营经济的“麦加”，对私营经济及其业主有着一种感同身受的体悟，因此近些年来对这一问题较为关注，在承接并高质量地完成了相关的省社科研究课题的同时，还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国家和省级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这些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由零星、模糊逐步趋于明朗和系统化。而在直接着手这一国家课题时，在具体的调研过程中，还有一个多少让我觉得宽慰的是，我国的私营经济及其企业主，相对较少区域间的差别。尽管不同省份私营企业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但却具有同构性。这就使我在对调查区域和对象的选择上有了较高自由度。因此，为本课题研究所进行的实地调研主要在浙江、广东和辽宁等东部省份，而又以浙江为剖解问题的主要“麻雀”，其他的实证资料则主要借助他人的调查研究材料，特别是《中国私营经济年

鉴》1995、1996、2000 版，《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 ~ 1998）、（1999）等权威资料。

该研究论题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动态性极强、难度又颇大的课题，好在“无知者无畏”；况且，毕竟还是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以这一课题为契机，期盼着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批评、指教，为今后的研究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转型社会中的 私营企业主

在历经了长期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之后，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广袤的幅员、悠久的历史、特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独特的改革之路，使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而这一变局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原有阶级阶层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形成发展则是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它们处于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最前端的结构性部分，很大程度上也因此是与原先的社会体制异质性最高的部分，从而留给人们更多的思索、探讨乃至诘难的空间。同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一样，私营企业主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发展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一次偶发事件。它不是突然产生，也不会蓦地消失。其产生有它的既定逻辑，不会凭空而来；其发展有它的阶段性，不会一蹴而就。除非不可抗拒的非经济因素，否则不会中途夭折，即便中途夭折，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又会重现。时下，它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社会的肌体之中，成为我们社会生命循环系统的一分子。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都必须直面这一现实。我们亟需做的就是以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来厘清自己的思路，弄清他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往何方？他们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特性？这些正是本章要着重研究的问题。

一、产生及其社会来源分析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私营企业主的再生

众所周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大陆上的资产阶级在 80 年代以前已不复存在。1978 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达 56%，集体经济占 43%，非公有制经济仅剩 1%，也就是幸存下来的 14 万个体户，而私营经济已经绝迹。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不是 50 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工商业者的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渊缘与承继关系。他们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形成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基础上，通过雇佣劳动的途径重新产生的。应当指出的是，他们的产生事实上并非是、起码不全是什么刻意的理性设计产物。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在改革之初并未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至少在 1979 年春寒料峭时著名的“五老火锅宴”上没有想到；即便到了 1985 年 10 月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也还只是说：“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① 他在这里提到的还仅是个体经济而不是其发展产物——私营经济。因此，现时期私营经济的生成，主要是源于 70 年代末开始的社会转型大背景的客观推动。

所谓社会转型，按照通常的理解，是指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新的社会转型理论把社会转型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9 页。

动。根据李培林的看法，这种变动有三层基本涵义：一是指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还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它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是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三是指它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是由一组结构变化的参数来说明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宏观描述和抽象分析。当然，作为其中最前端也最直观的转换首先就是经济结构的转换。在 70 年代末的中国，它所包含的是两个基本变革，即：由初级工业化向成熟工业化的转变，以及由传统的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尽管体制转型是最初动因，然而，两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并行发展。私营经济及其业主的出现和发展，正是循着这样的轨迹行进的。

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就已开始。但是，真正的工业化进程，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被动员起来加入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并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则是 1949 年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后。从那时起，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极高速度发展，至 70 年代末，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并初步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种工业化仅仅是一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距离真正工业化的实现还相当遥远。而遗憾的是，这种继续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和潜在的巨大空间，在很长时期却被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严重束缚，1979 年之前每一次对体制的调整，都因没有跳出这一体制而告失败。直至 70 年代末，这一经济体制的弊端尽显，其曾经有过的优越性已悉数耗尽，国民经济也几乎到达崩溃边缘之时，体制的自我改革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和潮流。这一改革的实质内容，就是通过向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创造相对自由的流动资源和活动空间，以调动每一个社会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这一体制改革的基本结果之一，就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这样，继续工业化和体制转型，构成了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在中国重新出现和发展的特定双重背景。

由于我国改革的渐进式特征或通常所称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方略，我们的大多数理论和政策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追认。这一方面给了改革的先行者们以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但同时又是以冒着极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为高昂代价的。于是，适应这种特定形势的变通方式，就是在 80 年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盛行的“看到红灯绕着走”的“擦边球”做法。这一做法看似有点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当时禁区颇多、“暗礁”频频的特殊时期，却也给了许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诸多改革举措以一个亮相、试验的难得机会。私营经济及其企业主的形成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且战且走”的不寻常氛围中逐渐成长的。自 80 年代以来温州经济的时扬时抑就是一个典型缩影。

在时间的长河中，20 年非常短暂，但对于中国私营经济来说却蔚为壮观。尽管发展历程充满坎坷，它们从农村到城市，经历了在猜忌中萌芽、在夹缝中生长、在春风中勃发的曲折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它们是在骂声中长大，在围剿中成长，是在“三只眼睛”（即“左”眼——带着“左”的思想看待私营经济，白眼——主要指社会对它们总体认识和评价上的鄙视和不屑，红眼——社会其它阶层对他们所拥有财富的羡慕乃至非分的觊觎）的严厉注视下发展起来，简言之，是在与偏见的艰难抗争中获得的。即便如此，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这短暂的时日里，中国